

文類卷之一

賦

瑟賦

元

趙郡蘇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輯訂

蘇天爵研究

劉永海 著

SUTIANJUE YANJIU

木薨年五十四

爵

撰



人民出版社

小裏之飄風兮肇五弦於十
章作而增八灑有香弦兮
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
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
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天爵研究/刘永海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01-015058-1

I. ①苏… II. ①刘… III. ①苏天爵(1294~1352)—人物研究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365 号



苏天爵研究

SUTIANJUE YANJIU

刘永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15058-1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一、苏天爵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学者因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正如学者所云，“苏天爵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①

对于苏天爵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苏天爵宦海生涯多年，是元代著名官员，出色的政治家，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并一直努力把这些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中。他倡导为臣要忠于职守，致力于报效朝廷；他十分重视教化，时时提倡儒学；他为官一生，清廉一世，克己奉公；他在各地为官，特别注意爱惜民力，体恤民情；他对吏治腐败深恶痛绝，提出过很多行之有效的整顿吏治的建议。他不仅对古代圣哲的政治思想有精当的理解与阐发，在亲身实践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苏天爵为维护元朝的封建统治，改善吏治，做出了特别贡献。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丰厚政治遗产。他的诸多政治思想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值得认真研究。开展对苏天爵的深入研

^① 苏天爵《滋溪文稿》（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前言》，第9页。以下引用此书版本相同。

究，无疑是继承和发扬这份遗产的最好方式之一。

第二，苏天爵有多年在监察、司法系统中为官的经历，他始终秉公执法，不仅为许多冤狱平反，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贤良，上书弹劾奸恶，惩治那些作奸犯科的贪墨之徒。所到之处，士民无不交口称赞，得到了“当代包公”的美誉。苏天爵对于如何加强司法的公正性，树立朝廷在百姓中的威信，如何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尽可能避免冤假错案的频发，如何加大对贪赃枉法官员的惩处等方面，都有深刻而且切合实际的见解。他在司法监察领域的实践与思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史的内涵，对于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司法工作者认真总结。

第三，苏天爵是元朝后期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苏天爵几度参与皇朝实录的撰修，关于如何修撰三朝史，有深刻的见解。他著述颇多，今存《滋溪文稿》《元朝名臣事略》《治世龟鉴》《刘文靖公遗事》等，另纂有《元文类》。苏天爵是元代久负盛名的文学家。时人赞“其为文，长于序事”，其文章“成一家之言”，“其诗尤得古法”^①。赵汭称赞天爵的文章“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既若“珠璧”那样夺目耀眼，又如同“菽粟之为味”^②，朴实无华，平易温厚。苏天爵为后人提供的丰厚文史资料和可贵思想，是元代史学、元代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第四，在元代理学发展史、传播史上，苏天爵也有一定的地位。从学术渊源上，他宗许、刘，崇吴澄，赞陆学，游于南北儒学之间，颇得义理而归之。这在门户之见盛行的元代来说，是十分难得的。苏天爵虽然不是理学家，但其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史学思想都带有浓厚的理学特征。因此，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升迁贬抑，苏天爵可谓一生鼓吹理学，时时以阐扬理学为己任。他还刊印《伊洛渊源录》《正学编》等著述，为理学这一官方正统思想的传播，做着扎扎实实的工作。仔细爬梳整理相关文献，对于准确认识元代儒学发展历程，是有积极意义的。

① 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26页。以下引用此书版本相同。

② 苏天爵《滋溪文稿》，《序》，第2页。

第五，随着河北地方史研究的日益繁荣与深入，苏天爵的历史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因之，本课题对于促进河北地方史的繁荣，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总之，本课题对于丰富元代乃至中国政治史、法制史、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学术意义。同时，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河北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挖掘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司法、文化建设提供资鉴。

二、苏天爵研究的学术回顾

据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对于苏天爵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叶。几十年来，相关著述有三十余篇（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诸方面。

第一，关于苏天爵著述的点校与出版。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了元统乙亥（1335）余治安勤有书堂刊本《元朝名臣事略》。1996年，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中华书局）出版。这两部书的点校与出版，极大地便利了学界对于苏天爵的深入研究。

第二，关于苏氏重要著述的研究。首先，关于《元朝名臣事略》的研究。台湾蒙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1937—2012）发表《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一文，（《大陆杂志》第22卷第5期，1961年，亦收入其《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该文重点探讨了《元朝名臣事略》的内容及其价值、《元朝名臣事略》与《元史》列传的关系，是研究苏天爵的奠基之作。韩儒林先生于影印《元朝名臣事略》序中指出了通行的乾隆中叶武英殿聚珍版诸多讹误。姚景安先生在其点校《元朝名臣事略》之《前言》部分概况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及版本源流。这部分文字同时发表在《文献》杂志上（1989年第3期）。颜培建《苏天爵的学术成就及其文献学上的贡献》（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梳理了《国朝名臣事略》的成书时间、版本、主要内容、编纂方法、价值与影响。屈宁《苏天爵与元代史学》（《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重点探讨了《国朝名臣事略》的史学价值。刘永海《论〈元朝名臣事略〉的编纂义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部书的材料

来源与取舍、编纂体例与方法等问题加以讨论。

其次,关于《滋溪文稿》的研究。孙克宽先生在其《元儒苏天爵学行述评》(收入《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1968年版)之后,附有《滋溪文稿别记》,研究了《滋溪文稿》的版本源流、基本内容。1997年,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中华书局),该书《前言》部分介绍了《滋溪文稿》的成书背景、内容、学术价值、版本源流,是目前为止《滋溪文稿》的最好版本。颜培建的学位论文辟专章对《滋溪文稿》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张力舟《伯修之文初探——〈滋溪文稿〉的价值》(《学术纵横》2008年第11期)重点探究了《滋溪文稿》文学方面的价值。

再次,关于《元文类》和《治世龟鉴》的研究。颜培建学位论文中,对苏天爵编纂的这两部书进行专门研究。颜培建还撰写了《苏天爵与〈治世龟鉴〉》一文(《展望论坛》2009年第3期)。周雪根就《国朝文类》的编纂意图、选文标准、编纂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元代文学的贡献等问题加以论述(《国朝文类》研究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屈宁探讨了《元文类》的编纂与成就(《苏天爵与元代史学》,《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

第三,关于苏天爵的生平及其交游的梳理。大部分学者都对苏天爵的生平、交游有过梳理。较为典型的有:孙克宽先生在其《滋溪文稿别记》一文中最先制成《苏天爵大事年表》。周雪根《苏天爵年谱》(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将谱主的生平事迹按年编排,基本理清了谱主的生平事迹。于纲下用目加以详细注解说明,对相关问题予以钩稽考证,详瞻细密,用力颇勤,是一篇研究苏天爵生平与交游的力作。颜培建根据苏天爵的入仕经历,把他的交游情况分为两个阶段,以供职翰林院前后为划分点。前一阶段主要是从学于名师长辈,后一阶段主要是朋友间的相处(《元代史学家苏天爵交游考述》,《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刘永海、武善忠《苏天爵生平述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一文从籍贯家世、国子求学、任职翰林、秉公执法、为官江浙等几个阶段对苏天爵的生平加以考述。赵东平介绍了苏天爵与安熙、马祖常、虞集、袁桷、齐履谦、陈旅、吴

澄等七位老师亦师亦友的关系及影响（《苏天爵师承考述》，《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武香兰着重梳理了苏天爵与宋本、宋褰的交游与友情（《元末名臣苏天爵与宋氏兄弟交游研究》，《兰台世界》2011年第5期）。

第四，关于苏天爵学术贡献及学术思想的研究。孙克宽先生的《元儒苏天爵学行述评》将苏氏学术大要概括为义理之学、文献之学、文章之学三大领域，可谓精辟。学界的研究大体是围绕这几方面展开的。

首先，从政治、法律角度开展研究。彭凤鸣重点探讨了苏天爵的真儒善治和经世致用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仁政观念，并对苏氏的思想以及其对当今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加以探讨（《论苏天爵》，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赵东平考察了苏天爵的台察实绩及法制思想（《苏天爵及其法制实践与思想》，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饶鑫贤、吴海航《苏天爵——元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传播者和卫护者》（《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一文，研究了苏天爵的法律观、礼治思想与德治观。武香兰对苏天爵最为人称道的三次监察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元末名臣苏天爵监察活动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她还认为，苏天爵具有高尚的为官操行，其优秀的品质，一方面源于严格家教下儒家文化对他的浓厚熏陶，另一方面源于祖辈们尤其是父亲苏志道的榜样示范效应（《元末名臣苏天爵为官操行溯源》，《韶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刘永海、武善忠《论苏天爵整顿吏治的主张与实践》（《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指出，苏天爵主张官吏要明确国家设官宗旨，牢记为官使命；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举荐贤良，打击奸佞贪墨；充实地方官僚队伍，完善选拔进补机制；裁汰冗官，改革俸禄制度。对元末吏治的整顿起了一定作用。

其次，从史学、历史编纂学等角度着手研究。江湄对苏天爵的史学成就和历史贡献进行了研究（《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元代杰出史家苏天爵》，《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屈宁《苏天爵与元代史学》（《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探讨了苏天爵的历史编纂思想与理论上的卓识。彭凤鸣分析了苏天爵史学方面的贡献（《论苏天爵》，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刘永海还撰文说，苏天爵的事功史观主要表现在自觉记述元朝立国以来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成就，浓厚的忧患意识，提倡多施仁政、爱民厚生的思想等方面（《论苏天爵的事功史观》，《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他还认为，苏天爵的史学思想中有浓厚的理学倾向（《论苏天爵理学思想的史学倾向》，《济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周雪根以为苏天爵重修过武宗实录，修过英宗、文宗实录（《再论苏天爵与实录——与温岭、陈高华、孟繁清等先生商榷》，《长江论坛》2009年第1期）。孟繁清《苏天爵墓址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考证了苏天爵墓址的具体地点所在，介绍了墓志铭碑盖的一些相关情况。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论及苏天爵的文献学思想。颜培建的学位论文从文献辑录、历史编纂两方面研究了苏天爵的思想与主张。陈子丹、罗锋《苏天爵与档案文献编纂》（《兰台世界》2009年第23期）一文，探讨了苏天爵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再次，从文学角度开展研究。闫盟《论苏天爵的文学思想》（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认为，“经世致用”是苏天爵创作的最高标准和评价文章的基本准则，也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文史合一、以文存史，体现了他对汉族文化的继承与延续；“文质彬彬”，既重质实的内容，又不忽略辞采之美，则体现了苏天爵对儒家文学观的坚守；“知无不言”，强调文章的讽谏作用，体现了苏天爵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不平则鸣”则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元文类》的选文定篇、修撰意图，是其文学观念的生动再现。祖籍同为正定县新城铺的梁波先生编著《元代包公苏天爵》一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以文学叙述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元代包公”形象。

此外，颜培建简要概况了苏天爵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原因，并对这项研究做了展望（《元代史学家苏天爵研究刍议》，《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苏天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在苏天爵生平事迹、交游关系、为官政绩等基本史实方面的考证与爬梳，成果较为集中。基于《元朝名臣事略》和《滋溪文稿》点校本的出版，关于这两部书的内容、版本、学术价值等层面的研究也有不少。近些年，从法律、史学、

文学等角度考察苏天爵历史贡献的文章多了起来，说明学界对苏天爵的关注正在日益走向深入。

但是，有些研究还有待深入，从整体上对苏天爵进行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因之，本课题试图要解决如下问题。

第一，立足第一手资料，汲取与课题有关的先行成果，系统梳理苏天爵的籍贯家世、生平事迹和社会交游，以图全面展示苏天爵一生之行迹。

第二，系统整理苏天爵的忠君思想、理学主张、法制思想、人才思想、民本思想、治吏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丰富元史乃至古代史研究的内涵。

第三，归纳苏天爵历史编纂成就，总结其历史编纂思想。

第四，深入挖掘苏天爵的史学思想。

目 录

第一章 籍贯家世、生平事迹和社会交际	1
第一节 籍贯家世	1
第二节 生平事迹	4
一、国子求学	5
二、丁忧守孝	8
三、任职翰林院	9
四、在监察系统任职	11
五、为官江浙、征战沙场	16
第三节 社会交际	20
一、授业恩师	20
二、博学鸿儒	22
三、同乡耆旧	29
四、后学晚辈	33
第二章 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38
第一节 忠君思想及其实践	38
一、为元初盛世、当下时政歌功颂德	38
二、希望当时君主效法古贤德君主,恪守为君之道	44

三、宣讲为臣之道,当无条件忠于君主	55
第二节 弘扬儒学,重视教化	62
一、以弘扬儒学为己任,重视教化的思想和实践	62
二、提出学校既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又是教化一方的思想基地	67
三、褒扬孝悌之举和贞节妇道	72
第三节 法制思想与实践	75
一、重视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76
二、用刑以宽仁为本,既要慎重,又要平允适中	79
三、断狱严明,公正判讼	81
四、惩治司法贪腐,听狱宜速,严刑慎赦,选用合格刑狱官吏	85
第四节 人才思想与实践	89
一、总结元初的人才政策,称赞仁宗开科取士的举措	89
二、强调科举的用世旨归,希望读书人成为匡时济俗之才	92
三、不拘一格重用贤能之士,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93
四、为人才的隐而弗彰、英年早逝而惋惜	95
第五节 整顿吏治的主张与实践	99
一、明确国家设官宗旨,牢记为官使命	99
二、履行台宪职责,加强对官吏的监察	100
三、举荐贤良,打击奸佞贪墨	102
四、充实地方官僚队伍,完善选拔进补机制	104
五、裁汰冗官,改革俸禄制度	105
第六节 民本思想及其实践	107
一、事不妄作,以息其民的思想	107
二、哀矜黎民,务施实惠的主张	110
三、分析盗贼多有的原因,建言朝廷体恤民情,关爱百姓	114
第三章 历史编纂成就及编纂思想	118
第一节 史学著作的编纂与刊行	118
一、《元朝名臣事略》	118

二、《治世龟鉴》	127
三、其他史学著述的编撰	131
第二节 历史编纂思想	145
一、修史当得其人、得书的观念	145
二、不分贵贱、善恶并载的求真精神	149
三、重视记载本朝史实的意识	151
第四章 苏天爵的史学思想	155
第一节 苏天爵史学思想中的理学倾向	155
一、受理学影响的通变思想	155
二、以王道德治,作为衡量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准	160
三、注意考察“正心”说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作用	168
四、强调学校和教育有益于治道的历史经验	172
第二节 经世致用的史学意识	175
一、丰富的历史借鉴思想	175
二、经世致用的事功史观	188
附 录	198
一、《元史·苏天爵传》	198
二、苏天爵简谱	200
三、《元文类》著者、篇名、卷次、类别一览表	217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48

第一章 籍贯家世、生平事迹和社会交游

第一节 籍贯家世

苏天爵（1294—1352），元代文学家，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元诗选》二集苏天爵小传云：“学者因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正定地处燕南，列居中土，乃“古圣贤过化之地，礼乐政教所由出也”。^①当汉唐宋金之世，文武将相辈出。入元以来，更是屡有怀才抱艺之士。“延祐以来，省试擢置伦魁者三人，亦可谓盛矣”。^②正定县新城铺村是一个有着近三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村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早在殷商时代，这里就是奴隶主“胙”氏部落聚集地。东周时期，姬姓白狄族人即以新市（今新城铺村）莫都，建立鲜虞国。在新城铺村北城岗（鲜虞国都城新市城墙遗址）曾出土过很多弥足珍贵的青铜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些青铜器今天仍然在无声地讲述着这块古老土地的沧桑变化。

元代真定苏氏与宋朝眉山苏氏同为唐朝宰相苏味道后裔，苏味道始居栾城，为真定苏氏与眉山苏氏之祖。“苏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显，宋太

①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新乐县壁里书院记》。

②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四，《燕南乡贡进士题名记》。

师、文忠公轼父子兄弟，称来城焉，所从来远矣，继之者修撰君也。”^① 真定苏氏由行唐迁至栾城，再徙至真定。^②

苏家为赵郡著姓。天爵曾高祖苏公彦，“韞德弗仕”^③。高祖苏元老，又称玉城翁，“资淳厚，仪状伟然，尝慷慨有大志”，卒于至元十三年（1276），享年八十六^④，一说卒于九十^⑤。娶孙氏，一子。曾祖苏诚，字诚夫，“少长戎马，尚气节，喜施与，尤谨孝养”；金末曾一度“以其家从金主徙汴”，金亡后返回故里。“居久之，遂以资雄其乡，乐周人之急”。苏诚非常注意对子女的教育，“时郡邑新定，无知学者，独能教其子，为郡人先”^⑥。卒于大德二年（1298），享年七十八。娶毕氏，子五人，曰荣祖、曰立、曰实、曰信、曰德顺。祖荣祖，字显之，以其斋而号威如，人称“威如先生”。荣祖一度从都转运使辟，监真定税务，以廉平称。未几，以亲老辞去，不复仕终身，年三十七而卒，时至元十二年（1275）^⑦。娶吴氏，子二，长志道，次殇，女二。祖母吴氏，卒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外祖父刘成，字立甫，“貌魁岸奇伟”，卒于延祐三年（1316），享年八十有四。^⑧

苏天爵父苏志道（1261—1320），字子宁，以吏起家，历任山西河东道按察司书吏，监察御史书吏转户部令史，吏枢密院中书掾，出官承直郎，中书省检校官，刑部主事，枢密院断事府经历，岭北省郎中。有能名，“终始不离吏事，然皆有可称者”，“未尝一事苟废其职者也”。^⑨ 尤其是参与处理江南白

① 王理《元朝名臣事略·序》，苏天爵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1996年版。下引引用此书版本相同。

② 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七，《苏公神道碑铭》；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

③ 苏天爵《元文类》卷五六，邓文原《苏府君墓表》。

④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四，《真定苏氏先莹碑》。

⑤ 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七，《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神道碑》。

⑥ 苏天爵《元文类》卷三一，宋本《滋溪书堂记》。

⑦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四，《真定苏氏先莹碑》。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一，宋本《滋溪草堂记》亦有部分记述。

⑧ 《元文类》卷五五，马祖常《征行百户刘君墓碣铭》。

⑨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

云宗狱及岭北赈济饥民事件，颇有声誉。

白云宗是宋代在杭州地区弘化的清觉法师所开创的地方性宗派，到元代之后，这一宗派却变质为非佛非道的宗教结社，而且对社会的影响也有若干不良记录，教团所产生的腐化现象甚为明显。元朝灭南宋后，白云宗势力进一步发展，徒众多达数十万人，皆以出家为名，不纳赋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中央政府令白云宗田产依例输租，徒众与民一体负担赋役。经过整顿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白云宗再次获得合法地位。尤其是浙西白云宗多为“强梁富人，相率出厚贿要权贵。稍依傍释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诱劫持，合其徒数万，凌轹州县，为奸利不法者。——田庐资贿当没入者巨万，没入之良家子女数百”^①。为此，元朝政府再度出手打击白云宗。朝廷处理白云宗狱时，苏志道方任职于户部，得以参预。办案期间，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两年之内，“五往返京师，以具狱上”^②。出色地完成了朝廷的使命，打击了白云宗的势力。

延祐三年（1316），岭北地区爆发脱忽（火）赤叛乱，震惊朝野，时谓“关陕之变”^③。恰逢和林地区遭遇罕见的雪灾，“会天大雪，深丈余，车庐人畜压没。存者无以自活”。天灾人祸合二为一，岭北地区“至是，并塞之民奔溃四去”，号称“百年来生植殷富埒内地”的和林地区出现巨大的社会动荡，“畜僵死且尽，人并走和林乞食”。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社会上竟然出现“强者相食，弱者相枕藉死”的境况。若不及时救助，必将酿成大祸，而和林财政上却捉襟见肘，“时仓储仅五万石米、八十万钱”。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当务之急是选派官吏至和林赈救，但慑于和林地区动荡的社会形势和恶劣的自然灾害，诸多官吏皆畏葸不前。苏志道慷慨陈词：“岂臣子避事即安时耶？”^④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

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

③ 关于此次变乱的研究，参见党宝海《元朝廷祐年间北方边将脱忽赤叛乱考——读〈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④ 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七，《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神道碑》。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和黄潘《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四，《苏学士画像记》亦有类似记述。

旋即启程。

临行前，时任翰林院待制的苏志道好友王士熙赋诗送别，以“画省郎官貂帽侧，飞雪皑皑马鞞湿。马蹄雪深迟迟行，冷月悽云塞垣明”，“思君遥遥隔高城，南风城楼来雁鸣”等诗句表达对好友的敬佩与担心。^①另一友人，当时的文坛巨子袁桷亦有系列送别诗，诗中有“貂帽护寒沙，冰天阅岁华”，“重华新雨露，悲喜候车音”之句。^②诗中同样对苏志道不顾气候恶劣、形势严峻而毅然赴命赞赏有加，其中也隐隐含有几分既担忧又盼望凯旋的复杂心境。到达灾区，苏志道马不停蹄，即刻着手赈灾事宜。在深入了解灾区状况后，苏志道向朝廷奏明实情，并提出具体赈济方案。他写道，和林“仓储无几”，朝廷“勿惜一日之费”，应“急募富商大家”致粟实边，赈灾施救。中书省很快采纳了他的意见。由于措施得法，扎实有效，和林百姓度过了这场罕见的自然灾害，苏志道也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赞誉。

苏志道延祐七年（1320）二月卒，年六十。以公贵，赠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飞骑尉，真定县男。天爵母刘氏，封武功郡君，再封真定县君，延祐七年（1320）七月卒。^③

天爵妻张氏，封恒山郡君。^④子苏昌文，小名阿锁，“甫龀，而颖拔可就付”^⑤，曾名乘云。^⑥

第二节 生平事迹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⑦，苏天爵生于今河北省正定县新城

① 苏天爵《元文类》卷五，王士熙《送苏公岭北行省郎中》。

② 苏天爵《元文类》卷六，袁桷《送苏子宁赴岭北行省郎中》。

③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

④ 苏天爵《元文类》卷五六，宋本《真定张君墓表》。

⑤ 苏天爵《元文类》卷三一，宋本《滋溪书堂记》。

⑥ 宋褫《燕石集》卷一〇，《风流子》。

⑦ 关于苏天爵的出生时间，据《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元诗选》苏天爵小传推证。

铺村，一个三世儒家，富于藏书，严于教子的书香世家。^① 天爵之曾祖苏诚初至真定，便着手积攒图书。他“买别墅县之新市，作屋三楹，置书数十卷”，且以独能教其子闻名乡里。^② 其祖荣祖“幼颖悟，善学”，为人以孝悌闻，“事师尤谨，有疾，亲奉之”，对朋友以诚相待，令人宾服。荣祖“家藏书数百卷，手录讎校不倦”，^③ 随着苏氏藏书尺积寸累，代有增益，荣祖因其书屋筑于滋溪北岸名其曰“滋溪书堂”，他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学者。傅若金作诗以赞：“滋之水，濬且长。流安极，沛洋洋”；“滋之水，澹而文。丰乃积，淑后昆”。^④ 胡助亦有诗一首，咏苏氏滋溪书堂云：“三楹老屋藏缃帙，四世儒冠到绣衣”^⑤。元末诗人潘纯有诗赞滋溪书堂：“华屋书充栋，清溪树拂簷。波光浮藻井，云影乱牙签。四世风流在，诸生礼数严。归来谢宾客，长日下疏帘”^⑥。诸多名士赞咏滋溪书堂，足见其藏书之富、影响之大。此外，荣祖在学术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曾因金《大明历》，积算为书数篇。

天爵父历官宪府史、中书掾、刑部主事，终岭北行省郎中，“好读书，尤尊信《大学》及陆宣公《奏议》，未尝去左右。笃于教子，馀奉辄买书遗之”^⑦。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余卷以归。”^⑧ 天爵祖先世代为学，家中藏书万卷，又两代出仕，因此，苏天爵少年时代即受到其父苏志道的严格教育，受到浓厚的儒家文化的熏陶。

一、国子求学

除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影响之外，苏天爵很早就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

① 有的学者认为苏天爵为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人，是将天爵祖籍与出生地混为一谈了。参见穆德全《元代石家庄史学家苏天爵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② 苏天爵《元文类》卷三一，宋本《滋溪书堂记》。

③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四，《真定苏化先莹碑》。

④ 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卷一，《滋之水，奉题苏氏滋溪书堂》。

⑤ 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四，《苏伯修滋溪书堂》。

⑥ 顾瑛《草堂雅集》卷八，潘纯《题苏伯修滋溪书堂》。

⑦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

⑧ 苏天爵《元文类》卷三一，宋本《滋溪书堂记》。